

卢 云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汉晋文化地理

漢晉文化地理

盧 云著

汉晋文化地理

卢云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85印张 13插页 430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1929—2/K·10

(简精) 定价：11.80元

序

《汉晋文化地理》一书是卢云同志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现在正式出版了，我感到很高兴。这是国内第一部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专著，作者的创造性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成绩，已受到十余位参加答辩与评审的专家学者的热情赞许与肯定。作为导师，我仅想在这里谈两个问题：一是开展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二是如何把历史文化地理搞上去。

历史文化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文化发展的地域特征极为显著，历史文化资料之丰富，在世界各国中也是无与伦比的。照理，这门学科早就应该发展繁荣起来，但遗憾的是，它却长期处在极度薄弱的状态。在二三十年代，曾有丁文江等几位学者粗略地摸过学术文化地理与人才分布，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特别是建国后的很长时期里，这类研究竟无嗣响。近年来港台和海外一些学者陆续作了新的努力，不过虽有开拓之功，难免粗略之病。为什么建国后大陆的历史文化地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呢？这存在着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建国后，我国学科结构长期深受苏联四十年代旧体制的影响，地理

学仅被分为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两大部类，而包括文化地理学在内的其它人文地理内容均被取消了，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文化地理的发展自然难以受到重视。同时，在长期的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历史学研究的重心也一直集中在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政治史、经济史与农民战争史等方面，某些传统文化有时还被视作封建主义的精神产品，除了泛泛地予以批判之外，很少有人愿意对文化的演变过程，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地域差异作较深入的研究，因为这是相当冒风险的事。从主观上说，文化地理研究对资料的要求较高，包括纵向的不同时代的材料与横向的不同地区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往往相当分散，需要做一番艰苦的爬梳工作。这也使许多同志对此缺乏兴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上的左倾禁锢得以解放，社会科学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可喜局面。在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相继重建的同时，人文地理也再次受到重视与承认。但是在历史地理学内部，由于长期偏重于历史政治地理、经济地理、自然地理等方面，历史文化地理一时还拿不出具有足够份量的成果来。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整个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同样在历史学领域，近年来虽然形成了一股经久不息的“文化热”，但文化研究中也普遍存在着忽视地域性的倾向。举个例子来说，自五四以来，不少人认为，中国文化，至少汉族文化，主要就是孔子思想与儒家礼教。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即便是汉族区域，也从来没有形成过纵贯各个时代、广被各个地区的同一文化，儒家学说始终没有建立起它的一统天下。由此可见，对传统文化分地域分阶段的具体分析，也构成文化史研究中极待加强的一环。

卢云同志经过前后六年的努力，不仅对汉晋时期学术文化区

域特征进行了广泛探讨，而且把宗教文化、婚姻文化、音乐文化等也引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以一种新的角度，展示了对汉晋社会与文化的更细致、更透彻的再认识。在研究方法上，卢云同志也作了不少可贵的尝试。在某种意义上，该书可以说开拓了历史地理的一个新领域，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并且对文化史研究也有所裨益。

历史文化地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花大力气认真予以研究。但是，该怎样把这门学科搞上去呢？我认为，首先，要注重基础性的工作，那就是：广泛占有原始资料，努力理清基本事实。乾嘉学者在经学、小学、史学方面的成果之所以迄今仍还被徵引、被重视，原因就在于他们所从事的是基础工作。现在有些同志做学问，不肯先下功夫做基础工作，就急于找规律，建立体系或模式，这不是牢靠的办法。当然我并不是说规律与体系不重要，但这是较高层次上的工作，没有扎实的基础就谈规律与体系，无疑是空中楼阁。卢云同志在搜集、排比、分析及统计处理资料方面应该说是下了很可观的功夫，这是此书能够取得显著成就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文化地理学研究，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文化现象本身上，还必须与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与自然地理密切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一份正确的历史时期的政区地图，就无法确切地进行文化要素的区域统计，更无法制出文化分布图来。同样，如不了解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类型，对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兴衰变迁也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历史地理学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密切关联的系统，只有对历史时期各类地理要素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才有可能科学地揭示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此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成果与方法，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也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目前正在准备组织力量，对当代文化区域进行实际考察与问卷调查，预计这一工作会大大推进文化地理的研究。

卢云同志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汉晋时代的主要文化形态作了较系统的探讨，这为以后各阶段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基础。卢云同志也有志于继续一段一段地搞下去，这当然是件很好的事。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投身于这一领域，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原到边疆，把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文化面貌理清楚，把文化区域的历史变迁搞明白，这样，科学的历史文化地理学一定能建立起来，整个中国历史地理学也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谭其骧

1988年5月

绪 论

一、文化、文化地理与历史文化地理

什么是历史文化地理？它的学科性质如何？研究对象是什么？具有哪些主要特征？与相关学科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什么是文化与文化地理谈起。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众多学科普遍使用的概念。在国际国内学术界，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界说。

在我国古代，文化一词起源很早，指“文治教化”之意^{〔1〕}。西方文化一词出自拉丁文“Cultura”，原意为耕作，引伸至人们培育、创造、发展起来的与天然状态有别的事物。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是由英国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根据德国学者古斯塔夫·克勒姆的《文化学通论》发展而来，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指出：“文化或文明是一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个人而获得的能力与习惯。”在这里，泰勒已把文化作为一个综合体，但还局限在精神文化方面。后来美国的一些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在泰勒阐释的基础上，增加了“实物”，即物质文化的内容^{〔2〕}。自本世纪

以来，随着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迅速发展，文化的界说日益增多。据克鲁伯与克拉克洪的统计，从1871年至1951年，文化的定义已达164之多^{〔3〕}。此后更不断有新的定义涌现。这些纷杂的定义，主要是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不同表述方式对文化加以不同的解释，但总的说来，仍不出泰勒关于文化是一复杂整体这一基本观念。

在我国，自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始，梁启超、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人已开始对文化概念加以阐释。至三四十年代，随着西方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传播，文化研究逐渐深入，许多学者力图对文化作出明确的概念与分类，为此做了大量工作^{〔4〕}。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文化研究长期受到冷落。近年来，从史学界反思传统文化开始，至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的再建，文化研究呈现出一股热潮。自然，文化是什么？又首先引起人们的关注，各种阐释纷纭而出，不过基本上均未超出国际学术界的界说范围。

大体说来，文化内容可分为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两大部分，它包括历史与现实中人类思想、风俗、生活方式、物质目标的创造与积累，以及对自然与社会极为复杂的适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文化则应是全部自然史与人类史的成果与结晶。

人类文化与地理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任何文化的创造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空间范围，受到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文化一经形成，便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并构成人类环境的人为部分。因此，作为从空间角度与人地关系上展开的文化研究，文化地理学理所当然地发展起来。

文化地理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规律的科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相当丰富，主要

包括文化景观的形态描述与成因分析、文化源地与文化传播、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文化区域的划置、结构与变迁等。

文化不仅具有地域性，同时还具有显著的历史承袭性，各类文化现象的地理特征，无不具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探求历史时期文化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阐述当代文化景观与文化区域的历史成因，这就是历史文化地理。历史文化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又被视作文化地理学中的一个分支，从理论上说，现代文化地理的一切研究对象，也都是历史文化地理的课题内容。

但历史文化地理所研究的是以往时代的文化环境，具有本身的特殊性，因此，它事实上与当代文化地理还是有着不少差异。就研究手段而论，当代文化地理主要依靠大量的调查、统计与观察；而历史文化地理在注重实地考察的同时，对古代文献资料的研究也具有突出的地位。古代文化面貌的复原离不开文献记载，即使是实地考察的资料，也需用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就研究对象而论，当代文化地理虽也包括精神文化的内容，但侧重点在物质文化方面，诸如民居、道路、田野、服饰等，都是文化景观的重要表征。而历史文化地理更多的偏重于精神文化，如思想、学术、宗教、艺术、民俗等，这一方面因为古代文化景观历经沧桑变迁，不易复原，而精神文化则通过文献资料较多地保留着；另一方面，在人类文化遗产中，精神文化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当然，随着整个科学事业的进步，历史文化地理在研究手段上会不断进步，研究领域也必将日益扩大。

二、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现状与意义

在国际学术界，历史文化地理已经历了长期的酝酿与发展。自文化地理研究开始起步时，历史文化地理的探讨也就出现了。

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德国地理学大师洪堡与李特尔曾就人类对自然的适应、宗教与民俗的起源、传耕等作过描述。拉采尔最早使用文化景观的概念，他的文化景观亦表述为历史景观。美国地理学家D.S.惠特尔西还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提出文化景观的“相继占用”概念。美国文化地理学大师C.O.索尔在本世纪初，曾努力使文化地理学从人文地理学中独立出来。此后文化地理学发展更为迅速，语言、宗教、音乐、美学等方面的地理研究日益丰富，而这些研究都与历史文化地理密不可分。近年来，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开始引进计量等新的科学方法，并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相互渗透〔5〕。

在本世纪上半叶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中，英国传播学派、德国文化圈学派与美国文化历史学派也十分注重文化的空间分布与区域联系，对文化传播与文化区域曾做过大量研究。美国学者威斯勒等人建立了“年代与区域假说”，著名人类学家克鲁伯为此作过重要说明。此外，林托恩阐述过“边缘遗存”的设想，埃里克逊论证了与此密切相关的动态文化、离心文化的概念〔6〕，这些课题实际上也应是历史文化地理的内容。

那么，我国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状况如何呢？这里不妨做一简略回顾。在建国前，能够称得上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论文仅寥寥数篇，如丁文江《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线啸筠《清代学者之地理分布》等〔7〕，而且这些研究都还比较粗浅。此外，还有一批关于地方或地域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如贺昌群《江南文化与两浙文人》、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史念海《秦汉时代关西人民的尚武精神》等〔8〕。这类论文涉猎领域较前者为广，有些质量也很高，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发展更具有促进意义。

建国后,受苏联学科结构的影响,包括文化地理学在内的人文地理学被经济地理学所取代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也被取消,长期无人问津。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导致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长期中断,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形成了一块明显的空白。近年来,由于文化研究的复兴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需要,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开始了新的起步。谭其骧师在1986年复旦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一文^[9],在与会代表中引起热烈反响。这篇论文高度概括了二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域特征,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周振鹤、游汝杰对中国历史方言地理的研究,也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成果^[10]。

近年来,港台地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也有所发展,如严耕望《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一文,系统阐述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流行地域及各地文化的发展状况^[11]。陈正祥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与《中国历史与文化地理图册》,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作了广泛的研究^[12]。虽然他所论述的方志、城市、黄河、运河、黄土高原、地名等都已形成或归属于其它独立学科,在内容上也不免过于粗略,但陈氏开创之举,功不可没。

日本汉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也有不少研究,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在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中,涉及到历史文化地理内容。这方面可以前田正名《河西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一书为例,作者在分析河西地区政治、民族、农业、商业、城市、人口等地理分布状况的同时,对该地与西域、长安的文化交流,该地的音乐、舞蹈等作了详尽的论述^[13]。另一方面是在史学的研究中,对某些地域文化特征的探讨。如胜村哲也关于东汉

知识分子地域差别与自律性的研究，就颇具新义^[14]。不过，在日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专门之作尚不多见。

总之，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在海内海外虽已取得一些成绩，但至今仍处在起步阶段，大多数方面都相当薄弱，甚至空白，非常缺乏系统的研究。这种状况对于具有悠久文化传统与丰富历史遗产的我国来说，是极不相称的。加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探求历史时期各地区文化发展的基本面貌与相互关系，不仅对历史地理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大有裨益，对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同样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课题内容与研究方法

在我国现存唐代以前的古籍中，有两份系统的民俗文化地理资料，即《汉书·地理志》“风俗篇”与《隋书·地理志》“九州风俗概述”。它们各自按照自己的区域体系，全面论述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学术文化、宗教信仰、婚丧礼俗、士民风气、农商好尚等文化总貌。本文就是从这两份资料的研究开始的。1982年，谭其骧师在授课中指出：如把《汉书·地理志》“风俗篇”与《隋书·地理志》“九州风俗概述”加以比较，阐明汉魏南北朝各地区文化的变迁，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受此启发，笔者即着手于这方面的探索。当时是以复原汉魏南北朝的文化区域为主旨，首先以《汉书·地理志》“风俗篇”为纲，用疏证的形式，爬梳经史诸子，遍检文集金石，将各种资料分门别类地会聚在“风俗篇”各条之下。

完成初步资料工作后，笔者感到，文献中反映出的各地民俗文化方面的内容，远远超出《汉书·地理志》“风俗篇”的概括范围，并且具有鲜明的分布特征。在进行文化区域的综合研究之

前，有必要先对各类文化现象加以分门别类的探讨。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历史文化地理是一个极为广阔但至今尚未得以开垦的处女地。如果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各类资料按空间加以排列，再辅之以科学的适用的研究方法，可能会开拓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方向。因此，在导师的指导下，笔者首先进行了学术文化的地理研究，并以《汉晋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为题，撰述了硕士学位论文。1985年后，笔者有幸继续师从谭先生深造，遂进一步从事宗教文化、婚姻形态、士民风气、音乐艺术、城市文化、文化区诸方面的地理研究。目前的博士论文，即这些研究的主要成果。现对文中课题内容与研究方法略作如下说明。

本文的时代断限是从西汉至西晋。因为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说，这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阶段。永嘉之乱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相继在中原的立国与大批北方士民向周边的流徙，极大地改变了各地经济与文化的面貌，从而开始了文化分布上的新格局。但本文上限并不完全限定在西汉，因为文化具有显著的承袭性，在论述这一时期各地文化面貌的形成过程时，不得不在许多地方追溯至先秦时代。

本文主要以精神文化为研究内容，而精神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庞大系统，包含着众多的内容。限于篇幅，这里选择了四项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专题。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学术与宗教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它们不仅体现着所处时代与地域的文化精神，而且直接影响着其它文化形态的历史面貌。因此，本文第一章首先探讨了学术文化的区域诸特征，如文化的发达区域与各类人才分布、文化的区域构成与区域特色、文化的空间传播与发展重心等，以及它们在各阶段所呈现的复杂变迁。

第二章研究宗教文化的地理分布。宗教文化与宗教有别，含义更为宽泛，这里不仅包括了宗教形态，而且还包括准宗教形态。西晋以前，佛教虽已传入，但尚未充分发展，这一时期是中国土著宗教文化占优势的时代。我国宗教文化具有两大特点：其一，巫术影响比较显著；其二，与学术、政治关系密切。较多地体现着这些特点的方士文化、谶纬神学与早期道教，是汉晋宗教文化的重要内容。方士文化、谶纬神学与早期道教都起源于滨海地域，有着一以贯之的历史传统，它们还表现出巨大的传播力量，掀起过三次全国性宗教文化浪潮。本文探讨了这三种宗教文化相继在滨海环境下形成、发展并向全国推进的历史过程，它们在兴盛期的空间分布、衰退期的区域遗存，以及对汉晋政治与历史表现出的复杂影响。

民俗文化是文化系统中最具有传统性的一个层面，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婚姻、丧葬、节日、风尚等，均属它的范围。民俗根植于民间，直观地反映着不同地区的文化风貌。第三章选择了民俗中最具代表性的婚姻形态为对象，具体探讨了西汉早期鲜为人知的借妻婚、奔婚、男女聚会、长女不嫁等古老婚俗的分布特征与地域变迁，婚姻礼制在汉晋时期的空间传播及其对各地婚俗的改造，各周边民族中的主要婚姻形态与历史演变等。

艺术是传统文化的又一主要组成部分。在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领域中，以音乐文化的资料最为丰富，地理特征也最为突出。故第四章选择了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雅乐中心的分布与转移，俗乐区域基本格局的形成与演变，音乐风格与地理环境、区域文化背景的密切关系，各地音乐文化的交流等。

人类文化是一个在功能与结构上相互联系、共生共存的系统，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学术、宗教、艺术、民俗等总是表现

出共同的区域特征，形成文化的区域综合体，这就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文化区域。在上述各章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最后概述了汉晋时期的文化区域及其变迁，并以此作为全篇的结语。

作为历史文化地理，它与文化史的研究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首先，在资料方面，历史文化地理要求较高。本文不仅需要同一地区不同时代的资料，同时也需要同一时代不同地区的资料；不仅需要定性的描述，也需要可以相互比较的数量指标。其次，在统筹全局方面，需要处理更复杂的文化关系。因为本文所探讨的文化现象，时间与空间的跨度都很大，又涉及到政治状况、经济基础、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等各方面内容，不仅要把握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还要论证各类文化区域的历史变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采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 统计的方法

本文主要统计了各类文化人才的籍贯分布，各地区所出的书籍，各地区教育规模与发展状况，各地区所出的方士、谶纬家，各地区的婚例等。所据资料，多数是爬梳各类史籍而来，一部分借助了历代特别是清人的研究成果，再进行一些校讎、补缺、考定人物籍贯的工作。统计资料不仅提供了各地文化发展的数量指标，为区域间文化状况的比较提供了条件，而且还可弥补不少地区文献记载的缺乏，有助于从不同侧面对各地区、各阶段的各类文化内容进行系统研究。

2. 制图的方法

地图是描述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的常用工具，本文中的28幅地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料性地图，主要为根据各类统计结果而绘制的示意图、分布图，以及在多种分布图基础上绘制的叠合图。分布图从不同专题直观地表现出各类文化要素的分布状况与

密度，而叠合图则是多种文化要素的综合表现与相互印证，有利于克服单项统计上的种种局限。另一类地图是结果性地图，即一些研究成果在地图上的直观说明。笔者还尝试绘制了一些专题性系列地图，如方土文化、谶纬神学、婚姻礼制等不同时代的分布图，旨在提供一种连续的文化横断面，以展示文化现象的空间发展动态。

当然，无论是统计还是制图，都必须与文献资料的运用密切结合。

3. 民族学的方法

在社会风俗文化的研究中，民族学资料往往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各民族的发展很不平衡，在一些民族中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化现象，往往在另外一些民族中仍活生生地保留着。本文婚姻形态部分就较多运用了我国与世界古今民族的婚姻资料，以与汉晋时期汉民族及周边民族的婚姻习俗相比较。通过这一方法，我们可对古代一些记载相当简略的婚俗，对它们的形态特征、起源、演变及其在人类婚姻史中所占有的地位，产生更科学更详实的认识。

4. 区域比较法

区域比较法是历史文化地理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是本文通篇采用的方法。以第一章学术文化为例，文中通过对不同区域文化发展的比较，鉴别文化的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通过对同一朝代不同时期及不同朝代的比较，探求文化发达区域的扩展与收缩，边远地区的文野变迁；通过对各地文化成份的比较，分析文化传播与各地区文化特色的变迁；通过上述的综合比较，确定文化重心的所在与转移。其它各章中，各类文化分布区的划定，文化特征的分析，区域的历史演变，也都建立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